

世纪风铃——新校园文化素养丛书

主 编◆汪信砚 副主编◆左汉平

左亚文 潘伯祥 著

老树新枝分外春。
年轻的思想注入传统的学科，成熟的气
度与创造的力量从书页中迸发。
以“读者”为本重新选择和组织知识，
给人以生活和发展的智慧。

智慧

哲 学 启 示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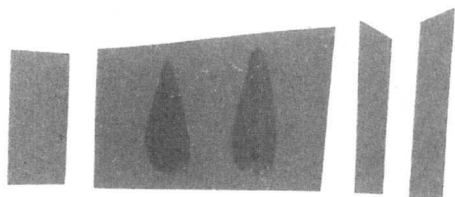
之



智慧之恋

哲 学 启 示 录

左亚文 著
潘伯祥



世纪风铃——新校园文化素养丛书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智慧之恋:哲学启示录/左亚文 潘伯祥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2

(世纪风铃:新校园文化素养丛书/汪信砚主编)

ISBN 7-216-02508-3

I. 智…

II. 左…

III. 哲学—普及读物

IV. B-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0041 号

智慧之恋—哲学启示录

左亚文 著
潘伯祥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印刷:武汉市科普教育印刷厂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1.375

字数:219 千字

插页:5

版次:1999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 640

定价:15.00 元

书号:ISBN 7-216-02508-3/B·133

序

当代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良好的教养，没有牢固的知识，没有丰富的智力素养和多方面的智力兴趣，要把一个人提高到道德尊严感的高度是不可思议的。”为此，他大力倡导文化素质教育，强调人们“应当特别重视那些培养人的灵魂、意识、情感和信念的知识”。苏霍姆林斯基对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视和强调是针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整个时代而言的，同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也具有极为显著的意义。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人类的生存境况极为尴尬的时代。借助于各种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当代人类从自然界攫取了不可胜数的资源，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过上了过去做梦也不敢想的富足而便利的物质生活。然而，当代人类并未由此进入理想中的极乐世界。与物质生活的富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利益冲突、宗教淡化、战争危险、热核威胁、技术异化以及人与人的疏离，使得当代人陷入了极度的精神困惑和迷惘之中。信仰危机、理想缺失、道德失范、自我感、意义感和归属感的丧失以及心态失衡、个性扭曲等等，已成为当代世界极其普遍而又严重的问题。正如一首诗所云：人们走入了手段的王国，却迷失了人的目

标;跨进了物质的天堂,却跌下了精神的深渊。对此,当代许多富有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思想家都充满了深深的忧虑。他们指出,如果不能克服这种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二律背反、走出这种精神的深渊,人类终将失去做为人的尊严感,将会沦为“没有灵魂的机器”或“没有情欲的色鬼”;而要疗治当代人的心理疾患、帮助人们找回失去的精神家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就是必须借重于教育来重塑人的精神世界。用汤因比的话来说,就是要“使人理解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找到正确的生活方式”。用池田大作的的话来说,就是要“寻求新的人性”,造就“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强烈的责任感和坚强的自制力”的新人。而用苏霍姆林斯基的话来说,则是要特别注意用“像文学、历史这些文科知识”“来充实人的灵魂”。上述这些当代著名的思想家们可谓是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他们实际上是在以各自的方式呼唤着对人的文化素质教育。

当代中国社会既面临着我们这个时代所共有的困扰,同时又内存着它自身所特有的问题。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开始了全方位的改革开放,步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改革开放之途曲折多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步履维艰,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国民的文化素质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现代化建设要求人们具有很强的科学精神和法理意识,但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人却是文盲、科盲、法盲,满脑子充斥着家族裙带观念和小农意识;现代化建设呼唤着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但许多人却缺少起码的现代民主意识,或者认为政治民主化就是西方化,或者觉得民主纯粹是一种负担和累赘;现代化建设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激发了人们的欲望和期待,但不少人却权利意识强烈而责任和义务观念淡薄,如此等等。可以说,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途程中的每一步都受到了国民文化素质低下的羁绊和拖累。

进入 90 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全面地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以确认个人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地位为前提、以市场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和等价交换为内在运行机制,它为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和创造能力的充分发挥提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但同时也对人的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个人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经济、法律和道义上的全部责任。然而,几年来的实践表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并没有得到它所要求于人们的相应文化素质的支撑,社会生活中原本已得到较充分表露的国民的文化素质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之间的不相适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变得更加突出。今天,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相当一部分人中的行时走俏及其导致的物欲横流、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尔虞我诈以及社会文化生活的商业化、浅表化和庸俗化,已经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它们正严重地制约着我国市场的正常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些问题的产生固然有着多方面的复杂原因,但人们文化素质的低下却是其中极为关键的一个方面。有感于此,许多有识之士都振臂呼吁应该大力加强对国民特别是对青年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并迅速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同和响应。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强化文化素质教育的问题被正式提上了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工作的议事日程。

文化素质教育的目的乃在于培养和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文化素质是一个标示人的内在世界的特性、状态和修养水平的总括性概念,它是人们通过对相关文化知识的学习、领悟和在特定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养成的内在品质或内在气质。大体上说,人的文化素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的思维能力,包括思维的开拓创新能力、认知判断能力、善恶辨识能力和审美鉴赏能力;二是人的精神境界,它是人的理想、信念、德性、意志、情感等精神要

素的总体发展状态和水平。人的文化素养就是其思维能力和精神境界的有机统一。由是观之,人们的文化素质状况也是一个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程度的基本标志,而强化文化素质教育则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

人的文化素质是可以借助于特定的学问来加以培养和提高的。伊斯巴哈尼曾说:“缺乏智慧的灵魂是僵死的灵魂,若以学问来加以充实,它就能恢复生气,犹如雨水浇灌荒芜的土地一样。”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学问在人的文化素质培养中都具有同样的作用。对此,近代的弗兰西斯·培根就已有明确的认识。他曾指出:“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学问变化气质’。……精神上的缺陷没有一种是不能由相当的学问来补救的。”在这里,培根在肯定人的文化素质的可塑性和学问对于人的文化素质培养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揭示了不同的学问在人的文化素质培养中起着不同性质和类别的作用。当然,不同的学问在人的文化素质培养中的作用的不同,不仅表现在其作用的性质和类别上,而且也表现在其作用的大小和方式上,也就是说,有的学问在人的文化素质培养中的作用要显著一些,有的则不那么明显;有的学问对人的文化素质培养的作用要直接一些,有的则间接一些。应该说,在人类的科学文化体系中,那些直接或间接地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或学科对人的文化素质培养来说是最为重要的。这些学科凝聚着人类长期以来对于宇宙、社会、人生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思考,表达了人类对于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德性、坚强的意志和美好的情感的无限珍重,体现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的不息追求,记载了人类千百年来苦苦求索和守望精神家园的曲折心路历程,它们对于疗治现代社会的心理疾患、安抚现代人的灵魂和帮助人们找回失去的精神家园,对于健全人们的心智、促进人们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教育,对于增强人们的思维能力和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具有十

分直接而显著的作用。在当前的文化素质教育中,我们要特别重视这类与人的文化素质培养关系密切的学科。

人的文化素质的培养和提高,离不开对相关文化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无论是人的思维能力的增强还是精神境界的提高,都必须以相关文化知识的积累和扩展为基础和前提。我们之所以说那些直接或间接地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人的文化素质培养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就是因为它们含蕴着特别有助于增强人的思维能力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丰富知识。就此而言,强化文化素质教育,也就是要使人们获取多方面的文化知识,特别是使人们掌握那些对人的文化素质培养具有直接和显著作用的学科的丰富知识。但另一方面,人的文化素质并不归结为其所获得的知识,一个人拥有丰富的知识并不等于他必然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要有效地培养和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不仅要使他们具备尽可能广博的相关文化知识,而且还应使其真正理解和领悟这些知识,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迪,从而能够并善于运用这些知识。正如培根所说:“多诈的人藐视学问,愚鲁的人羡慕学问,聪明的人运用学问,因为学问本身并不教人如何用它们;这种运用之道乃是学问以外、学问以上的一种智能,是由观察体会才能得到的。”因此,进行文化素质教育,既要注意传授相关的文化知识,更要注意帮助人们深刻地领悟和自觉地运用这些知识,使其真正起到增强人们的思维能力、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的作用。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世纪风铃——新校园文化素养丛书》。丛书在选题上侧重于与人的文化素质培养密切相关的一些学科,力求以一种轻松、活泼而又浸润着严肃思考的方式来阐释这些学科对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对人的自我完善和实际生活的价值和意义,着重在与人的素质培养的关系中发掘这些学科存在、发展的理由和根据,回答这些学科到底能给人们一些什么智慧或对人们有些什么启迪、它们直接间接地对人的

生存、活动和发展特别是对人的思维能力的增强和精神境界的提高能有什么用处或影响以及它们是怎样实现其作用和影响的等问题,其目的不在于向读者系统地介绍这些学科的知识,而是要为读者自觉地选择、接受和领悟这些学科的知识提供认识上的向导。丛书的编写无意于在学科知识这个静态的层面上去追求自身的完整性,而是始终坚持以读者这个活生生的对象的知识需求和阅读心理为内在的参照系,努力做到保持与读者进行开放式的对话和交流。丛书的作者都是其所涉学科领域中才华出众、很有造诣的中青年学者,他们的丰富学识和辛勤劳作使得本丛书既具有很高的学术品位又充满了盎然的生气。

20 世纪即将逝去,21 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新的世纪包孕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它必将对人们的文化素质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亲爱的读者,愿我们这套丛书似世纪风铃,使你从中受到启迪,使你的文化素质得到提高,使你能够以更加健全的心智从容自若地走入 21 世纪!

汪信砚

1998 年 10 月于武汉大学

引 言

哲学是一门最为古老而又最具创造性的科学。二千多年以来，当人类文明的曙光刚刚露出历史的地平线时，哲学就作为一门包罗万象的学问降临于世。

在漫长的岁月变迁中，哲学伴随着社会的变动经历了一条坎坷不平的进化之路。它时而被抬高为“科学的科学”，尊崇有加；时而遭到贬斥，备受冷落；它孕育了近、现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它自己却不得不开辟新的领域，重新确立自己的位置。正如一位现代哲人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1885—1981）所说的，哲学是各门科学的开路先锋，当她播下真理的种子，却“把胜利的果实留给她的女儿们那许多门科学了，而她自己则怀着神圣

的永不满足的情愫又继续向前，去思考那些未可必的未曾探索的事物。”

philosophy（哲学）一词，是从古希腊文的 philein 和 sophia 两个词演化而来的。philein 是“爱”的意思；sophia 是“智慧”的意思，这两个词结合起来组成的 philosophy 就是“爱智慧”。后来，19 世纪的日本学者西周（1827—1877）首次用汉语的“哲学”来翻译 philosophy 这门学问。“哲”在古汉语里也是智慧之意。《尔雅》释“哲”字说：“哲，智也。”哲学，就是爱智之学。从哲学的词源中，我们隐约可以窥见哲学的秘密：它起源于人们对智慧的追求，而对智慧的追求则成为哲学发展的不竭源泉。

人是理性的存在物，理性的本质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马克思语）。人的自由、自觉和自主的实践不仅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而且是人类智慧产生的基础。当最初的人类跨过“人猿相揖别”的门槛时，就产生了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于是就产生了认识自我、认识对象以及认识自我和对象的关系的渴望。面对浩瀚无穷的宇宙世界和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原始人感到迷惑不解。这种“诧异”促使他们思考种种奇异现象产生的原因，乃至提出宇宙是怎样生成的这样的世界观问题。开始，人类求助于原始宗教和神话来解答这类问题，例如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就是

借助于神话对宇宙形成和演化的一种臆测，这为哲学的产生准备了最初的前提。

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既然人们研究哲学是为了摆脱无知，那就很明显，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所以，尽管哲学的产生归根结底源于人们的实践活动，但是其直接原因却是为了追求智慧，摆脱无知，因而哲学并不是“一门生产知识”，而是“唯一的一门自由的学问”。

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智慧之学正式形成于人类进入奴隶制之后的文明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日益扩大，作为统治阶级的奴隶主阶级不仅从生产中脱离出来，而且从统治阶级中分化出专门从事教育、著述及其他文化科学工作（例如进行历法、天文、数学、逻辑、医学研究等）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兴趣，对当时所有的知识领域和已有的智慧都要进行学习和研究，因而往往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头脑。由于知识的这种未分化状态，哲学在开始时是作为一门包罗万象的“知识总汇”出现的。

到了近代，随着各门实证科学纷纷从哲学的“母体”中分化出来，哲学作为“科学之科学”的高贵地位开始受到冲击，哲学研究的领域似乎变得越来越狭小了。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必须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并规定自己的研究对象。

当哲学从具体科学的领域里退出来后，哲学应该以什么为研究对象呢？哲学作为智慧之学应该在哪儿寻找它的价值依归呢？当天文学、物理学以及化学的诞生取代了古代哲学家对世界本原和宇宙演化的形而上的思考后，近代的哲学家开始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认识论问题上，力图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于是，哲学的本体论研究失落了。

哲学的这种研究状况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其间由于传统习惯的作用，仍有一些哲学家在执着探求宇宙和人生的最普遍的问题，但是，这种研究却不断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两个方面的攻击，以至在本世纪 30—40 年代，逻辑实证主义者还打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旗号，用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原则去消解形而上的哲学精神。于是乎，哲学的生存价值也遇到了挑战。

但是，哲学的危机同时也孕育着哲学重新复兴的生机。从本世纪 30~40 年代开始，以存在主义、弗洛伊德学说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汇集成一股强劲的国际性潮流，与唯科学主义潮流相抗衡。与此同时，在这些不同哲学流派的内部，也开始显露出形而上的本体回归。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波普尔就曾宣称：“把形而上学描绘成无意义的废话是浅薄的”，“我倾向于另一种看法，如果没有任何纯思辨的有时甚至是朦胧的形而上学信仰，科学发现是不

可能的。”

20 世纪中期哲学开始复兴的标志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纷呈，各种哲学观点相互争鸣；一些新的研究领域陆续被开创，一批新的分支学科相继被建立；自由探索的学术空气空前浓厚，广泛的国际间交流日益紧密。在人类智慧的园地里，呈现出一片百花齐放的蓬勃景象。

正是在哲学的这种曲折发展和自我反思中，哲学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合理位置和价值坐标。

哲学不是“科学的科学”，但是，它却“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马克思语）。它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集中体现了人类智慧的精髓，是人类智慧的最高理论升华。

哲学不是包罗万象的学问，但是，哲学作为世界观的理论，对各门具体科学提供根本的方法论指导，诚如爱因斯坦所明确说过的，科学发现和科学研究不能没有哲学的指导，否则将是盲目的和随机的。

哲学不是终极真理，它不可能像古代哲学家所奢望的一样，找到世界万物的终极本原，从而一劳永逸地破译宇宙的奥秘；也不可能给人们提供关于宇宙、人生的确切无误的标准答案。哲学不是几何数学，它没有唯一的固定的解。对于同一个题目，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解题方式并得出不同的结

论。任何哲学都不可能独享真理的占有权。但是，任何对人类认识产生过影响的哲学，都必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分享了真理，因而对于人们科学把握宇宙、人生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能够提供有益的启示，并指明正确认识的道路。

哲学不是发财致富的科学，它不能使我们富有，但是它能使我们自由。在这喧嚣嘈杂的感性世界中，唯有哲学，才能使我们找到那失落的精神家园，把握住那内在的理性灵魂。

哲学所具有的这些特点是由哲学的特定研究对象的特殊功能决定的。

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哲学也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笼统地提哲学以整个世界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不确切的，实际上，哲学是关于宇宙、人生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范围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人生观四个大的领域，其中本体论是基础，它具有统帅的作用。这四大领域之所以成为哲学的特殊研究对象，是因为它们都具有无限性、超验性的特点，无法用实证科学的观察、实验、调查、统计等方法去进行研究，只能借助抽象的理论思辨，通过总结和概括具体科学的成果去把握这些超验的无限的客体。这就是哲学的不可替代性。

哲学的这种特殊研究对象和特殊研究手段决定了它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具体地说，哲学的功能表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功能，一是它的价值评判功能。

哲学家们从不同的观测角度对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人生观问题进行探讨，其中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仅是人类知识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代表了人类最高层次的智慧。正因为如此，哲学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们的认识 and 实践活动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

哲学的价值评判功能主要体现在认识论、历史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上。价值关系是价值主体之间以及主体和客体之间普遍存在的一种关系，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这种关系？科学的价值评判标准是什么？怎样确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我们每日每时都要面对而且必须作出解答的问题。从表面上看，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似乎并不需要哲学，一个不懂哲学的人不一定不能正确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要真正自觉地把握科学的价值准则，使人们的朴素认识升华到理性的高度，必须有哲学的帮助；而且，在实际生活中，由于错误的价值导向，对于个人和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的事例屡见不鲜。例如，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判断是非得失的价值标准究竟是什么？是生产力标准？还是生产关系标准？对于个人来说，在善与恶、义与利、公与私、理与欲的关系问题上，在虚无主义和现实主义、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以

及达观主义和淑世主义等种种人生观和价值观面前，我们该作出怎样的抉择和处置？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价值评判问题，依赖传统的价值观念或个人的经验感受，往往会得出错误的判断。而哲学的使命就是借助于科学的知识和实践的经验，通过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等理性活动和研究工作，为人们提供正确的价值评判准则。

哲学作为一定时代的产物，必然要受它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认识和实践水平的制约，因而它的理论思维及其社会功能也必然带有时代的局限性。然而，哲学是新时代的报晓的雄鸡，文明的进化必然要在作为时代内在灵魂的哲学中首先表现出来，并作为理论的批判武器在社会变革中发挥“先导”的作用。

现在，人类正处在世纪之交的转折点上，新世纪如喷薄欲出的朝阳，她的曙光已露出历史的地平线。在这变动不居、高速发展的多极世界上，人类的内在精神也在经历着剧烈的裂变，人的自由、自觉和自主的意识正在发生质的升华。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的这种巨变催促着哲学自身的变革。一方面，对传统哲学的反思和挑战在各个领域将继续向深度发展；另一方面也提出了重建 21 世纪现代哲学的庄严任务。

重建现代哲学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哲学发展的逻辑的必然。自本世纪初以来，在对传统的反叛中